

论邓小平辩证看待社会思潮的方法与启示

周太山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陕西 西安 710055)

摘要:邓小平辩证地认识到社会思潮的影响在客观上既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邓小平用辩证方法对待社会思潮: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坚持疏导教育与法纪手段相结合。启示:要认识到社会思潮的存在给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的不仅仅是挑战,更多的还是机遇,要对马克思主义有理论自信;对社会思潮既不能钳制过紧,也不能放任自流,既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要用马克思主义引领;要采取辩证方法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开展意识形态斗争,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关键词:邓小平;辩证法;社会思潮;意识形态斗争

中图分类号: A 7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4)03-0001-05

On Deng Xiaoping's Dialectical View on Social Ideological Trend and Its Revelation

ZHOU Tai-shan

(Xi'an Univ. of Arch. & Tech., Xi'an 710055, China)

Abstract: With a dialectical view on the impact of social ideological trend, which is objectively of both the negative side and the positive side, Deng Xiaoping treats the social ideological trend in the way of adhering to the policy of “Let a hundred flowers blossom and a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 contend.”, and combining the guidance education with discipline means. Deng's view reveals that the existence of social ideological trend offers not only challenges but also chanc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rxism. Therefore, it is critical to have confidence in the theory of Marxism. We should neither restrain the social ideological trend too tightly nor leave it to follow its own inclination. Moreover it is indispensable to set up the idea of respecting for discrepancy and allowing for diversity, lead the ideological trend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rxism, and dialectically carry out ideological struggle through various channels in order to maintain ideology security of our country.

Key words: Deng Xiaoping; dialectics; social ideological trend; ideological struggle

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方法。邓小平是辩证法大师,一贯尊重“生活和历史的辩证法”^{[1]8}。“照辩证法办事”,是邓小平提出的至理名言。对于社会思潮,邓小平历来也是

收稿日期:2014-03-26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2012年科学研究项目计划人文社科项目“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研究”(12JK0203);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人文社科基金项目“新媒体时代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研究”(RW1205)

作者简介:周太山(1968-),男,湖北天门人,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思政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发展。

“照辩证法办事”。邓小平看待社会思潮的辩证法具有重大启示价值。

一、邓小平辩证地认识社会思潮的影响

1. 社会思潮的消极影响

邓小平认为,社会思潮的影响有消极的一面。改革开放之初,党内外有极少数人还深受极左思潮的毒害,攻击党的改革开放政策,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直接或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度的支持。这说明当时党内外有些人对社会思潮的消极影响认识不清。邓小平明确指出:“这两种思潮都是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都是妨碍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前进的”^{[2]166},“虽然这几种人在党内外都是极少数,但是不能因为他们是极少数而忽视他们的作用。事实证明,他们不但可以而且已经对我们的事业造成很大的危害”^{[2]166}。他特别提醒:“现在有一些社会思潮,特别是一些年轻人中的思潮,需要认真注意”^{[2]252}。

在改革开放深入进行的过程中,党内有些人在大力抓改革和经济建设的时候,却忽视了精神文明建设,对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社会思潮的斗争心存疑虑,似乎一讲思想斗争就是“左”,因而对思想战线的领导不力,软弱涣散。这种“一手硬、一手软”的领导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社会思潮的传播提供了可乘之机。其突出表现是,有些人在思想战线上制造精神污染,污染人们的灵魂。“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1]40},直接影响和干扰着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但对精神污染,党内有些人认为这符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还有些人怕伤了和气不敢进行批评。这说明党内有些人对社会思潮的消极影响还是没有足够的认识。邓小平明确指出:“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祸国误民”^{[1]44}。

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敏锐洞察力,

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初露苗头时就认识到了它的极大危害性,并告诫和教育全党要与之展开坚决的斗争。尽管邓小平反复强调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但胡耀邦和赵紫阳“没有传达”^{[1]196}、“没有执行”^{[1]324},结果发生了学潮和政治风波。邓小平说:“过去两个总书记都没有站住,并不是选的时候不合格。选的时候没有选错,但后来他们在根本问题上,就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上犯了错误,栽了跟头”^{[1]324}。可见,胡耀邦和赵紫阳“栽跟头”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认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消极影响。

苏东剧变后党内一些人对社会主义的前途缺乏信心,对党的基本路线的信仰产生了动摇。在党和国家处于紧要关头的时刻,邓小平发表了南方谈话,在谈话中提醒我们必须对社会思潮的消极影响保持清醒的头脑,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2. 社会思潮的积极影响

邓小平认为,社会思潮的影响,客观上既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党的思想和社会思潮并存,必然产生党的思想与社会思潮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这种意识形态斗争对我党有极大的好处,这种意识形态斗争的好处体现了社会思潮的客观影响的积极的一面。

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实行三三制的统一战线政策。根据这一政策,抗日民主政权中人员的分配,共产党员大体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在三三制政权内必然有政治上的争论。这种争论实际上就是党的思想与社会思潮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在邓小平看来,三三制政权下的意识形态斗争至少有六大好处:“它能够及时反映各阶级各方面的意见,使我们能够正确地细心地去考虑问题决定问题;它能够使我们从群众的表现中去检验我党的政策是否正确,是否为群众所了解所拥护;它能够使我们对于事物感觉灵敏,随时具有高度的警惕性;它能够使我们党得到群众的监督,克服党员堕落腐化的危险,及时发现投机分子以及破坏分子而清洗出党;它能在民主政治斗争中提高党员的斗争能力,使党更加接近群众,锻炼党使党成为群众的党”^{[3]12};“它可

以真正表露各阶级的意见和要求,也可以暴露某些党派的实质,使群众认清其面貌”^{[3]14}。

1957年,邓小平在西安干部会上又指出了意识形态斗争的第七大好处,即它可以发展马克思主义,防止马克思主义衰退。他说,对于各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思想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情况,我们党内不少人思想不通,不了解它的好处。“这十六个字的方针对我们国家有深远的影响,对我们党有极大的好处,对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很大的好处。如果我们不注意,不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思想要僵死起来,马克思主义要衰退,只有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种意见表达出来,进行争辩,才能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辩证唯物主义”^{[3]272-273}。

1978年,邓小平会见泰国记者访华团,在回答中国向西方开放是否担心会受到西方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影响时,又指出了意识形态斗争的第八大好处,即它可以开阔人们的眼界,活跃人们的思维,增强人们鉴别是非的能力。他说:“不担心这个问题。毛主席过去说过,他开始读孔夫子的书,以后学的是资本主义,但他终究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归根到底,要看我们的事情搞得不好。如果人民都知道我们自己走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那么,什么影响也不怕。至于有些人,就是没有外国人来,他也会受影响的。人们的眼界开阔些好,这样鉴别是非的能力只能增强,不会减弱”^[4]。

一言以蔽之,意识形态斗争可以使党的主张更加接近群众,可以使群众从自己的政治经验中更加信仰我们党,“才能使我党取得真正的优势”^{[3]9}。

由于邓小平辩证地认识了社会思潮的双重影响,因而他向来不怕社会思潮的消极影响,而是积极主张意识形态斗争。他还运用唯物辩证法“事物发展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的原理满怀信心地指出:“开放伤害不了我们。我们的同志就是怕引进坏的东西,最担心的是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恐怕我们有些老同志有这个担心。搞了一辈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忽然钻出个资本主义来,这个受不了,怕。影响不了的,影响不了的。肯定会带来一些消极因素,要意识到这一

点,但不难克服,有办法克服”^{[1]90}。

二、邓小平用辩证方法对待社会思潮

对待社会思潮,邓小平始终坚持用辩证方法而坚决反对用形而上学方法。他说:“我们在强调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的时候,仍然要注意防止‘左’的错误。过去那种简单片面、粗暴过火的所谓批判,以及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处理方法,决不能重复”^{[1]47}。

1. 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毛泽东1956年提出来的,是对待社会思潮的根本方法。“双百”方针提出来以后,党内不少人有所疑虑,不了解它的好处,甚至有抵触情绪,不少知识分子也有顾虑,担心实行这一方针会出现思想混乱。毛泽东就说,高级干部中“许多人实际上不赞成这个方针”^[5],苏联也不赞成^{[6]70-71}。邓小平坚决贯彻“双百”方针。他指出:“‘灭资兴无’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把思想垄断起来,不允许资产阶级思想出笼,只允许无产阶级思想一花独放。这种方法只会把思想搞僵化,并在政治上带来严重的后果。另一种方法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种方法能够经过争辩做到明辨是非,使真理在与谬论的斗争中发展起来。这种方法效果来得慢一些,但最靠得住”^{[7]1380}。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重申了“双百”方针,并强调“要永远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2]256}。邓小平坚持的“双百”方针是一个对待社会思潮的辩证方法,包含着放与争的辩证统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辩证统一、疏与导的辩证统一。

放与争的辩证统一。有人把“双百”方针错误地理解为鸣放绝对自由,甚至主张只让错误的东西放,不准马克思主义争,认为开展批评就违背了“双百”方针。对此,邓小平指出:“把开展批评同‘双百’方针对立起来,却是一种严重的误解或曲解”^{[1]46-47},“允许宣布资产阶级这一套,不允许共产主义者出来争?”^[8],“只让错误的东西放,不让马克思主义争。这还叫什么百家争鸣?这就把‘双百’方针这个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歪曲为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方针了”^{[1]47},“既然叫百家争

鸣,马克思主义至少算一家嘛”^{[7]931}。

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辩证统一。针对思想战线上的混乱状况和精神污染,邓小平指出:“中心的办法是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理论上的争鸣”^{[8]475}。“只要我们党真正加强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坚决克服软弱涣散的状态和自由主义态度,认真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思想战线的上述种种问题都可以解决,也不难解决”^{[1]46}。邓小平强调,在对有错误的同志进行批评的时候,要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要进行充分的说理和实事求是的分析,绝不能以偏概全,草木皆兵,不能以势压人,强词夺理,尤其要欢迎和鼓励他们进行诚恳的自我批评。有了这种自我批评就好,不要揪住不放。批评和自我批评都要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不能站在“左”的立场上。

疏与导的辩证统一。疏导是疏与导的辩证统一。不疏而导,导就是无的放矢,就会落空。疏的对立面是堵。邓小平反对堵。他指出:“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2]144-145}。疏而不导,就会失去正确的方向,造成混乱。对于学潮和政治风波,邓小平指出:“问题在于我们思想战线上出现了一些混乱,对青年学生引导不力。这是一个重大失误”^{[1]198}。“学生闹事,要向他们讲清楚危害在哪里,这就不能对他们只用拍拍肩膀的办法。要把是非讲清楚,要把利害讲清楚。是非是涉及我国根本利益的是非,利害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能不能达到本世纪目标和下世纪目标的重大利害。这才是对青年的爱护,对青年的真诚引导”^{[1]199}。

2. 坚持疏导教育与法纪手段相结合

对待社会思潮,邓小平还主张坚持疏导教育与法纪手段相结合。他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个长期教育的问题,同四个现代化建设将是并行的”,“既然是长期的事,不可能搞运动,只能靠经常性的说服教育,必要时采取一些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1]208}。在他看来,疏导教育与法纪手段的作用都是有限度的,需要密切配合、相互补充,但二者地位不同,疏导教育是主,法纪手段是辅。我们“不能搞运动,方法以教育、引导为主。当然,如果有人搞得我们总是不安宁,也不能排除使用某种专

政手段,使用纪律、法律手段”^{[1]211}。

邓小平坚持疏导教育与法纪手段相结合的思想由来已久。1954年他在政务会议讨论教育工作时就指出:“教学纪律必须整顿。苏联学校中的纪律是严得很的,我们派去的学生,如果不好好学习,就被送回来。这种严格的要求,我们要学习。对于学校中的个别坏学生是要开除的,学校要有‘开除学籍’这个武器,没有这个武器不行。开除几个坏学生,就可以教育和挽救一批学生。有的学生被开除以后,倒可能变好了。我们党内也有这种情况,有些同志背上有包袱,以为对他的错误没有办法,及至将他开除党籍,他倒变好了,有的人后来又入了党”^{[3]210}。1977年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又指出:“学校要把学生的思想工作做到家。对表现不好的要多做工作,对屡教不改的处理也要慎重。要找出各种方式,多做转化工作,把不好的转变为好的或者比较好的”,“对于表现太坏又屡教不改的,要开除学籍。流氓、阿飞根本不好好学习,你不开除,他就会把整个学校的风气搞坏”^{[2]56}。对犯错误的人,邓小平始终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弄清情况区别对待。犯错误的人,通过疏导教育,绝大多数是可以挽救的。因此,他主张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凡是能教育挽救的都要教育挽救,实在不能教育挽救的就要法纪处理。对于犯严重错误的人,一般情况下,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纠正其错误是为了取得教训,提高其觉悟,而不是为了把他“整死”。通过反复教育仍不能转变过来的,特别是触犯了刑律的,要采取法纪手段来解决,决不能手软。邓小平针对学生闹事问题就指出:“我们对学生闹事,前一阶段主要采取疏导的方法,是必要的。疏导,也包括运用法律的手段。如果破坏社会秩序,触犯了刑律,就必须坚决处理。”^{[1]194}

三、邓小平辩证看待社会思潮的启示

启示一:要认识到社会思潮的存在给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的不仅仅是挑战,更多的还是机遇,要对马克思主义有理论自信。这是邓小平辩

证地认识了社会思潮的双重影响,特别是对社会思潮的客观影响的积极的一面的八点揭示给我们的启示。真理与谬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是不怕同谬误斗争的,终究是要战胜谬误的。邓小平说:“不怕争,真理是愈辩愈明,如果马列主义被驳倒,那就说明马列主义不行”^[9],“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1]382}。我们要对马克思主义有理论自信,并要充分利用好社会思潮的存在给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的机遇。马克思主义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大道而产生的故步自封的学说。列宁在谈到马克思创立马克思主义时说:“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有批判地重新加以探讨,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放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重新加以探讨,从而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10]284-285},“共产主义是从人类知识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方面的典范”^{[10]284}。马克思主义是从人类知识的总和中产生的,也是在人类知识的总和中发展的。

启示二:对社会思潮既不能钳制过紧,也不能放任自流,既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要用马克思主义引领。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以及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决定了多样性的社会思潮的存在。“万马齐喑究可哀”,对社会思潮钳制过紧,人为地消灭社会思潮,不仅做不到,反而有害。

邓小平就说:“这一点,斯大林犯过错误,就是搞得太死了,搞得太单纯了。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在一个时期衰退了”^{[3]272}。对社会思潮我们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这也是尊重“生活和历史的辩证法”。同时,对社会思潮也不能放任自流,要用马克思主义引领。社会思潮的消极影响是巨大的,甚至灾难性的。放任自流,任其泛滥,会“造成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彻底破坏,造成四个现代化的彻底失败”^{[2]176}。我们一定要大力批判社会思潮,“绝对不能让它们流行”^{[2]337}。我们要坚持正面教育为主与社会思潮批判相结合的原则和方法,用马克思主义引领社会思潮,使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真正发挥主导作用”^{[1]46}。

启示三:要采取辩证方法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开展意识形态斗争,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真正的优势要表现在群众拥护上。把优势建筑在权力上是靠不住的”^{[3]10}。用权力消灭社会思潮只保留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会僵死衰退,有损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主要从依靠于我党主张的正确,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所拥护、所信赖的政治声望中去取得。只有积极开展意识形态斗争,才能“使我党取得真正的优势”^{[3]9},才能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要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疏导教育与法纪手段相结合等辩证方法,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开展意识形态斗争,以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我国已迈入新媒体时代,新媒体应该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2]255}。新媒体意识形态战已经打响,我们要充分利用好新媒体这块阵地。

参 考 文 献

-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4]邓小平.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70.
-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313.
- [6]黎之.文坛风云录[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
-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思想年编(1975—1997)[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475.
-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1327.
- [10]列宁.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